

“阿拉伯之春”：触因、演变及前景

作者：Stephan Rosiny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蔬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的自焚，触发了“阿拉伯之春”。短短数月之内，抗议浪潮摧毁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独裁者。自此之后，抗议活动令该地区陷入紧张状态，而此前，人们还以为该地区独裁统治稳定，能顽固抵抗民主的侵袭。

解析

“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北非及中东地区举行议会大选并讨论宪法，对残留的独裁统治的公开批评，主导着公众舆论。这些改变能有多彻底、多持久，现尚无法断言，但几个显著要点，已能确知。

- 反对运动质疑独裁政权的最初阶段所表现出的自发性、轻率性，不仅令西方的观察者、也让阿拉伯的统治者感到惊异。最初的惊诧之后，遗留下的独裁者们回归到其传统的统治稳定手段中来，只是迄今为止，成效有限。
- 触因、演变形式、深度，各国有所不同。各政府的反应，亦从谨慎让步到暴力镇压，各有不一。
- 大部分阿拉伯政府极度缺乏合法性，而公民们要求，最终能更公正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进程中来。在他们的抗议活动中，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象征标记及相互的关联。这些类似共性让“阿拉伯之春”成为该地区一时代性的新型事件。
- 众多阿拉伯国家里，温和派的伊斯兰教徒势力增强，现在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取代现有政府的另一出路，值得信赖，并能胜任这一职责。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社会运动，民主化，伊斯兰教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

“阿拉伯之春”始于隆冬。2010年12月17日，负责集市的女城管在突尼斯的西迪布宰德（Sidi Bouzid）小城没收了蔬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推车，原因是他无照经营。女城管按惯例行事，但这位年轻商贩所缺少的，也许不仅仅是一张执照，而是和某位显要人物的“关系”，或者缺少行贿所必需的金钱。他向上提出申诉，却被驳回。大概是屈辱、无助交集之下，他采取了绝望之举，在当地行政大楼前公开自焚。¹

随后的几小时、几天之内，人们就自发举行声援集会，武装力量杀害了一些集会人士，而他们又成为了后续示威活动上被追悼的烈士。阿拉伯新闻频道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播放了手机拍摄的自焚及随后示威游行的录像，成为“阿拉伯之春”推动情绪、动员群众的最重要媒介手段。抗议浪潮迅速地蔓延到首都突尼斯市，扩散到邻国。抗议活动不仅获得地域上的延伸，其社会组成结构也不断扩展，很快就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男女老少、穆斯林教徒及基督徒、宗教及世俗，特别是年轻人，都加入到示威中来。不到两个月，近东两个原以为是最为稳固的独裁者——突尼斯的宰因·阿里-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 Ben Ali, 2011年1月14日）与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2月11日）纷纷下台。

2011年初，抗议活动、动乱几乎席卷了全部的阿拉伯国家。迄今未受波及的只有海湾君主制国家卡塔尔，以及只出现过几场无关紧要的抗议活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收入能确保本国人民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阿拉伯之春”并非从天而降。数年来，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已经一再爆发反社会贫困、反国家专制的抗议示威、罢工活动。2000年起，跨国抗议活动增多。2000年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第二次“大起义”（Intifada）、2003年由美国指挥的伊拉克战争、2005至2006年出现的讽刺穆罕默德先知的漫画事件，引发了反对西方及以色列“攻击性

行为”的抗议活动，让人们为受害者举行声援大会。人们只是附带抗议本国政府，抨击他们尸位素餐。以色列及真主党之间的黎巴嫩战争（2006年）、加沙战争（2008及2009年）过程中，人们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抨击里，就蕴含着对那些或多或少公开支持以色列的政府，也就是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愤怒。

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演变

“阿拉伯之春”中，反对派的动员活动依据政治侧重点的不同，要么以1978至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为榜样，要么参照2005年3月黎巴嫩的“雪杉革命”。前一场革命通过群众运动，实现了中、近东迄今为止唯一的根本性体制转变，而后一场革命至少令叙利亚撤军。2009伊朗爆发了绿色革命，反对总统大选中出现的舞弊现象，也常常被视作榜样。

不管怎样，“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跨国发展，让它成为了迄今为止独一无二时代性事件。抗议活动一浪接一浪，不断攀升，跨国的交互作用，参与者惊人地摈弃了意识形态，展开了探讨，上述种种，皆是前所未闻的。地区性的示威动员活动不再主要针对外部敌人，如美国、以色列，而是致力于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的心愿：推翻或改革专制独裁统治体系。示威游行层层叠加，获得了全球媒体足够的关注力度，这样，统治者想采用消极应对或赤裸镇压的方法，就不再那么容易。

社会各界的广泛团结、自发而极大缺乏领导性，这一切令政府猝不及防，他们惯用的制止策略，也就是逮捕政治领袖、诽谤示威者为外国操纵的奸细的策略，也随之失效。他们的暴力镇压，令数千名示威者丧身，而社会各阶层都被广泛动员了起来，这些都让示威者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获得了合法性。与之相反，采取镇压手段的政府却此消彼长之下，日渐失去了道德优势及合法性。以维基解密轰动性地揭露统治者贪污腐败、政治上弄虚作假为起点，矗立在滥用职权之前的缄默之墙轰然坍塌，而对国家暴力的恐惧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独裁统治者现今却未能如期

¹ 岁末年初的时候，北非数十人以他为榜样，举行自焚，但是没有一场自焚能取得类似的动员效果。

望的那些，如同多米诺骨牌那样逐一倒下。2011年3月起，他们逐渐适应了新局面，动用了稳定统治的有效手段，取得了不同的成效：他们对示威者的要求作出部分妥协，比如说将不受欢迎的部长或者整个政府当成可能的替罪羊辞退或解散掉，或者承诺宪改。他们取消国家对基本食品及能源供应补贴的缩减，引入新的国家补助，在官僚部门及安全部门创造临时工作岗位，承诺加薪，借此收买顺民。在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Abdallah）国王宣布了两项金额高达一千三百亿美元的计划，用以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额外工资，引入失业补助，创造六万多新工作岗位，修葺清真寺，并资助一项包括五十万所住房的建筑项目（参见：Gause 2011）。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君主制国家，向埃及过渡军事委员会（SCAF）以及巴林、阿曼、摩洛哥及约旦这些受到威胁的政府施以援手，馈赠数十亿。约旦、摩洛哥获得加入石油王朝富豪俱乐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邀请。

独裁者们继续寄希望于分化、贬低反对派。他们将抗议人士斥为外国势力的“奸细”（埃及、巴林、沙特阿拉伯），谩骂他们是“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叙利亚）、“老鼠和蟑螂”（卡扎非（Qaddafi）于利比亚），或者恫吓种族宗教内战（巴林、叙利亚）会爆发。他们警告忧心忡忡的西方，政治自由化会导致伊斯兰原教徒以及圣战（吉哈德）恐怖分子势力增长（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如果一切手段不再奏效，他们就直接暴力镇压。2011年3月14日，巴林在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军队的帮助下，镇压了珍珠广场的占领活动，成为该方面的经典范例。随后，也门现有近两千人丧生，利比亚约三万人死亡，而目前截止，叙利亚的牺牲人数，已高达六千多人。不过这三个国家里，部分反对者拿起了武器回击。²

独裁者们在让步及镇压之间，常常摇摆不定，发出自相矛盾的讯号，导致突尼斯、埃及、也门及叙利亚的起义活动升级、激化。承诺改革，却又继续暴力镇压，让人无法信任他们的承诺。胡斯尼·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0日发表

的讲话让人感到失望，这本该敲响其他统治者的警钟。他在讲话中表明自己完全无意放弃权利，虽然此前，流言四起，说他会放弃权利。这促使聚集在解放（Tahrir）广场上的示威者们坚定了决心，也为他画上了终止符——一天之后，军方迫使他下台。

与此相反，君主们的手段更显高杆，比如摩洛哥的国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他倡导宪政改革，借此来稳定他的王朝，可以说，他由此成了内政改革运动的领头羊。卡塔尔的埃米尔——哈迈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资助半岛卫星电视台，参与反对卡扎非政府的军事行动，在制裁叙利亚政府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样，他摇身一变，甚至成为革命性变革的先驱。

要求

抗议开始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形：几个国家里，受过教育的青少年通过网络社区，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在市区中心发起集会，呼吁获得更多自由、反对国家独裁。埃及、巴林、黎巴嫩、突尼斯以前就发生过类似的“行为事件”。这次一切有所不同，因为参与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国家镇压未能制止、反而促使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抗议活动得到扩大。而在其他的国家，如突尼斯、约旦、巴林、叙利亚、阿曼这些国家，社会、宗教、种族、地域上受到歧视的边缘群体率先举行集会。

在一些国家，抗议活动仅限于个别团体，以至于未能形成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在沙特阿拉伯，反对派分为什叶派（Shia），他们数十年来要求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分为妇女反对派，她们要求在公共场合实现妇女解放，代表性要求为开车的权利；分为自由派，他们要求放宽严格的宗教、社会准则；也分为萨拉菲斯特主义者（Salafis），他们认为，道德要求已被过度放宽。

一些国家的地方性及城市性的抗议浪潮汇合成全国性的运动，特别是突尼斯、摩洛哥、巴林、利比亚这些国家，反抗活动尤其在那里得到巩固及扩展。

² 依据联合国2011年3月17日公布的1973号决议，在北约的总指挥下，一个国际军事联盟介入利比亚的战斗活动，而实际上，该联盟是站在起义者这一方的。

人们提出的要求也相应地更加广泛，包括在食品、住房、能源供应方面改善物质条件，提高服务，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最终实现国家制度改革：民主、三权分立、可靠的公共部门。人们按照各地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而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人们要求废除紧急状态立法。伊拉克要求美占领军撤离本国。巴勒斯坦人则要求，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Fatah）政府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Hamas）政府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府，结束巴勒斯坦政权分裂的状态。黎巴嫩的一场公民社会运动示威游行的目的是取缔教派体制，这一体制限制了，官职的分配、家庭法规都取决于人们所属的教派。由于害怕社会内部两极分化、暴力升级，在那些有过内战经历的国家，如黎巴嫩、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整体而言，人们提要求时就显得有节制得多了。

社会成分斑驳的抗议活动中，指导一切的共性要素却是道德伦理原则，尤其要求实现公正（Adala），获得自由（Hurriya）、尊严（Karama）、尊重（Ihtiram）：

- 政府当局应尊重其公民，而非采取傲慢的家长式管束；
- 有尊严地生活，而不受到国家安全力量及政府机构屈辱性的束缚、压迫；
- 公正地享受资源、机会，而不应推行顺我者昌；
- 用法制国家取缔专制独裁统治及统治阶级的特权自由，以及最后
- 能参与全球发展，以期进一步实现富裕、获得进步、发展教育、取得共同决策权。

最为激进的要求，也就是推翻统治体制这一要求，都是在政府方面武力升级的状况下才发生的，此时，现存上流社会统治下，无望逐步实现改革。迄今为止，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早已发展到这一地步，而在巴林、约旦，个别活动家也提出了“人民要求推翻体系制度”（al-Sha'b yurid isqat al-nizam）的要求。

阿拉伯之春的象征标志

“阿拉伯之春”的跨区域性的类似象征标志，将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联系到了一起，并将其发展为一股地区性动员活动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壮大的浪潮。这些象征标记及口号，创造出了能引起普遍共鸣的抗议文化。社交媒体如脸书、推特、手机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它们一开始就是最重要的通讯、动员工具。音乐也在流行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³ 半岛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al-Arabiya）等卫星频道，也迅速参与进来，它们能接触更为广阔的观众群体，能推动情绪，实现广泛动员，与西方媒体建立联系。这样，不时可以观察到多节式的通讯链：示威者展示阿拉伯语、英语的海报，手机拍摄后，传到网上，首先在阿拉伯的卫星电视台、然后在西方电视频道播放，全国、地区、国际的观众都能看到这些海报。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埃及“莲花革命”，西方的这类冠名，未能获得广泛认可。⁴ 它们打上了以往革命的印记，比如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5年的黎巴嫩雪杉革命。以植物为名，显示出它们与颜色革命关系密切。⁵ 颜色革命与“植物”革命都从社会中心内部出发，反抗僵固老化的统治结构。西方媒体惯用的“阿拉伯之春”概念，让人联想到积雪消融，独裁体系随之消解泯灭，而并非如过去那样，通过政变、政治暗杀、或由外界引发而实现“改朝换代”（如2003年的伊拉克）。在一些阿拉伯的评论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春天这类比喻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类比喻中片面地暗示了，民主化是参照西方模式进行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说突尼斯的“1·14革命”、“埃及革命”或者统称为“阿拉伯革命”（al-Thaura al-Arabiyya）。⁶

3 突尼斯的说唱歌手厄尔·简瑞诺（El Général, <www.youtube.com/watch?v=IeG1J70ouR0>，网页参考日期：2011年12月28日）以及以色列的嘻哈乐手诺伊·阿路许（Noy Alooshe）尤其变得声名大噪。

4 宰因·阿里-阿比丁·本·阿里将他1987年的夺权称为“茉莉花革命”，因此，这一名称在突尼斯含贬义成分。

5 比如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伊朗2009年的绿色革命。

6 北非的柏柏尔人、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参加了起义，他们反对这一概念，因为该概念将他们这些非阿拉伯种族的

上述种种革命自称是非社会的、自由的、或伊斯兰教的革命，而是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开展针对“政治体系”的起义。没有精英先锋领导他们，支撑起一切的，更多的是平面化组织的社会网络。并非是充满魅力的“领袖”，而是类似于布瓦吉吉以及2010年夏被埃及警察打死的博客博主哈立德·萨义德（Khalid Said）这些“英雄”，成为了革命形象代表。

几个国家的示威活动爆发于充满象征意义的日子里。1月25日是埃及的“警察日”，这一天，青少年示威分子聚集起来，反对警察的暴力干涉。2月14日是巴林庆祝2001年签订了国家改革宪章的周年纪念日，示威游行选择这天，旨在提醒应执行宪章。2006年2月17日，利比亚数名反对穆罕默德讽刺漫画的示威者被枪杀。死者的亲属在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聚集到一起，发生了暴力冲突，这成为了利比亚革命的导火线。这些反对运动按照特殊的日期来命名，突尼斯的“2·14阵线”就是依据本·阿里的离境日来命名的。巴林的“2·14运动”、摩洛哥的“2·20运动”、巴勒斯坦地区的“3·15运动”以及约旦的“3·24青年”，都是根据本国打破禁忌的第一场大型示威活动而命名的。

示威日被冠以独有的名称。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利比亚、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的示威浪潮的开始，被称为“愤怒日”（Yaum al-Ghadab）。重复同一名称，能建立直接的关联感。将其他冠以名称的日期串联起来，能动员及促进抗议活动的持续发展。这样就诞生了“尊严日”、“悔恨日”（伊拉克的2011年3月7日），以及旨在让叙利亚士兵调转枪口的“护国者日”（2011年5月27日）。地方协调委员会在叙利亚因事制宜，为示威游行拟定出合适的名称、口号，这是进行活动策划编排的重要手段。

抗议活动的另一跨国性的标志是占领主要街道、广场。在突尼斯，抗议者在突尼斯市的要塞广场（Place de la Kasbah）扎营、请愿。早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以前，哈比伯尔吉巴路（Boulevard Habib Bourguiba）上，示威活动就时有发生。在首都拉巴

人排除在外。

特市的穆罕默德五世大道（Boulevard Mohamad V）上也举行过集会。“阿拉伯之春”的普遍标志却是开罗的“解放广场”（Midan al-Tahrir），2011年1月25日起，该广场上就举行过众多的大型集会及广场占领活动。在开罗的市中心，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附近，比如秘密警察局总部、内政部、当时的执政党国家民主党（NDP）总部以及埃及国家博物馆附近，半岛电视台和许多其他的媒体将抗议活动的图像发送到全世界。旧政府的国家安全人员及打手团的血腥攻击，也被拍摄下来，这也许阻止了情况过度恶化，让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政府最终名誉彻底扫地。

在巴林，示威者们模仿埃及的成功先例。2011年2月14日起，他们顶着国家安全力量的暴力手段，试图长期占领首都麦纳麦市的“珍珠广场”（Sahat al-Lu'lu'a）。该广场是根据一座宏伟雕塑而命名的，1982年人们修建了这座雕塑，象征海湾合作委员会团结一致。政府害怕这个广场会成为全国反抗运动的象征标志，他们暴力清空广场之后，于2011年3月18日拆毁了这座醒目的雕塑。而在也门，被前总统萨利哈（Salih）的支持者所占据的解放广场，成为也门政府实现自己目标的活动据点。该广场座落于首都萨那，富有象征意义。而与此同时，反对派在大学前面的广场上扎营，并将该广场改名为“变革广场”（Sahat al-Taghyir）。

占领了这些广场，人民就占领了地理中心位置——也就是说国家的“心脏”，从“腐败的”政府手中夺回并“清理”心脏。⁷ 国旗成为灵活的象征标志。在利比亚，示威、起义分子将过去君主王朝的旗帜（1951-1969）当作卡扎非统治之前的时代的象征。叙利亚的反对者们用复兴党（Baath Party）篡权前本国通用的旗帜，取代现有的国旗。在埃及，隶属萨拉菲斯特群体的伊斯兰教徒是一个特例，他们使用沙特的旗帜。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柏柏尔人使用自己的旗帜，这样，他们表现出对柏柏尔人身份的共同认可，而不是分裂。马德里的太阳门（Puerta del Sol）以及以色列的罗斯柴尔德大

7 胡斯尼·穆巴拉克被推翻后，示威者从象征标记方面，更是从实际行动上清理了被“他们”解放的广场，让该广场成为崭新开端的标志。自此以后，那里定期举行抗议集会，以保护共同奋战实现的革命。

道 (Rothschild Boulevard) 上的抗议活动、欧美的各类“占领运动”，都沿袭了“阿拉伯之春”的象征标志。示威者沿用了占领广场这一行动方式，为集会日选取通俗易懂的名字，提出深远的要求，要代表“人民”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反对那一小撮肆无忌惮地攫取财富的统治阶层。

前景

2011年初，席卷了北非及近东的跨国抗议浪潮，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名字，载入（西方的）编年史。这一转变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无法预见其后续发展。叙利亚、也门武力冲突不断升级是否能成功解决、只是进行了局部改革的残存专制政权是否最终汲取了教训，都取决于突尼斯以及埃及这两个共和国的民主转型的成功程度。超越全部意识形态、基本无领导的状态下挑战暴力镇压机器，这本是“阿拉伯之春”起始阶段的强大之处，却在政治的秋冬季节，成为日益明显的缺陷。

由于旧政府丧失了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获得广泛的合法性、要在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下，创建国家机构、法规。革命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却实现了这一点，建立起了公共机构崭新开端，而其他国家，反对派以及政府上演着要求及让步之间的角力赛（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约旦、科威特）。相反，用王室恩赐（沙特阿拉伯、巴林）这种危机管理政策，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长久稳定。横隔于家长式统治以及自信心日益增强的人民之间的鸿沟，只会日趋加深。

改革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因为每做出一个决定，都会发生不同意识形态重点、利益矛盾的碰撞。在合法性上互为犄角的各类机构——议会、政府、审判系统、立法大会、宪法、总统及安全力量，都必须首先逐步重建。建设该从确定法规、选举代表开始，还是从宪法或普选开始？该授权谁来制定选举规则、监督哪些政党可以参加竞选，或确定选区划分？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协商过程、相互的确认及壮大，能带来长久的合法性，实现长治久安。对部分百

姓而言，这一过程可能耗时过长，因此变得兴致索然，而进程的结果也丧失了可信力度。推翻腐败统治者后，各方的高度期望——公平分配国家财富、经济迅速恢复，迄今仍是幻影。相反，因为旅游者纷纷却步，企业由于罢工、抗议活动遭受损失，社会经济状况甚至发生恶化。

温和派的伊斯兰教徒和激进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尤其能从中得利。希望落空、丧失财物而深受挫折之时，真主使他们忍耐，并许诺在另一界给与奖励，这样，他们的宗教伦理极具抚慰功效。他们的世界观灵活机动，可以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同时具有约束力及高度伦理要求。无论是城乡居民、鸿儒白丁、男女老少，温和派的伊斯兰教徒和极端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都能触动他们。温和的伊斯兰教徒，如穆斯林兄弟会，在过去（相当）自由选举中就获得了明显的成功（约旦于1989年，阿尔及利亚1991年，埃及2005年，巴勒斯坦地区2006年）。“阿拉伯之春”的天翻地覆之际，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并非总是站在最前线。他们享受着常年来持之以恒的反独裁政府工作带来的声誉。此外，通过自己的宗教、社会、政治机构网络，他们拥有组织机构，经验丰富，而这正是新生反对力量所欠缺的。因此，各种首次自由选举中，他们不出所料地获得卓越的成绩，在突尼斯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41.5的票数，摩洛哥2011年11月25日的选举中，温和的伊斯兰正义发展党（PJD）获得了百分之27的票数，成为最强大的政党并囊括总理席位（参见：Eibl 2011），而埃及的议会大选中，他们也表现不俗。在利比亚、也门、约旦，伊斯兰教徒也是未来大选的热门候选人。

迄今为止，在那些单一宗教的国家里，改革派伊斯兰教徒极为成功。与之相反，在那些多宗教国家里（黎巴嫩、伊拉克、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逊尼派及什叶派的行动人士对峙、争斗。逊尼派、什叶派的对立之下，伊斯兰教徒包容各类团体的政治思维方式，似乎现已捉襟见肘。同样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致力于社会、政治严格伊斯兰教化的原教派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亦成绩不俗。他们可能会成为立意改革的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挑战，因为他们对改革

派伊斯兰教徒的对伊斯兰宗教的忠诚提出质疑。但在埃及，已有迹象显示出，他们迫于压力，调整自身，采用文明的政治方式，开始放宽他们的要求（参见：Brown 2011）。

阿拉伯世界的公民要求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中来，能自由决定按照何种世界观规划未来的人生。西方应该以伙伴的身份、采用与活动人士对话的方式，参与到近东的演变进程中来，但不可摆出父权制的姿态，甚至动用军事手段。

参考文献

- Brown, Jonathan (2011), *Salafis and Sufis in Egypt* (埃及的萨拉菲斯特主义者以及苏非主义者),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网址: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alafis_sufis.pdf> (2011年12月22日).
- Eibl, Ferdinand (2011), *Parlamentswahlen in Marokko: Ende oder Anfang eines „marokkanischen Frühlings“?* (摩洛哥议会大选：“摩洛哥之春”的终结或开端?), *GIGA Focus Nahost*, 1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2011年12月22日).
- Gause III, F. Gregory (2011), *Saudi Arabia in the New Middle East* (新中东的沙特阿拉伯), Washing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63, special issue, 网址: <www.cfr.org/saudi-arabia/saudi-arabia-newmiddle-east/p26663> (2011年12月22日).

■ 作者简介

Stephan Rosiny 博士，是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IGA）中东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人员，研究重点为伊斯兰教、暴力与宗教、什叶派伊斯兰教、东阿拉伯地区。

邮件地址： <stephan.rosiny@giga-hamburg.de>，

网址： <<http://staff.en.giga-hamburg.de/rosiny>>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一号研究重点为“政治体系合法性及实效性”，由“非民主政权的持续及转变”小组负责，他们分析比较政治转变进程、选举的意义以及政府和反对派的相互作用。

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所内，“宗教、矛盾、政治”研究小组就二号研究重点——“暴力与安全”，开展伊斯兰教政治领域的探讨。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Bank, André (2011), *Turkey and the Arab Revolt: Rise or Decline in Regional Politics?* (土耳其与阿拉伯起义：地缘政治的兴盛或衰落?), GIGA Focus International, 4,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international>.

Richter, Thomas (2011), *30 Jahre Golfkooperationsrat: Schützt Mitgliedschaft vor Revolution?* (海湾合作委员会三十年：让成员免遭革命?), GIGA Focus Nahost, 5,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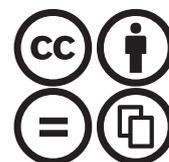
Rosiny, Stephan (2012), *The Arab Spring: Triggers, Dynamics and Prospects* (“阿拉伯之春”：诱因、演变及前景), GIGA Focus International, 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international>.

Rosiny, Stephan (2011), *Religionsgemeinschaften als Verfassungssubjekte: Libanon als Modell für Nahost?* (作为宪法主体的宗教团体：将黎巴嫩当成近东的典范?), GIGA Focus Nahost, 4,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Valbjørn, Morten, André Bank (2011), *The New Arab Cold War: Rediscovering the Arab Dimension of Middle East Regional Politics* (新阿拉伯冷战：再度发现中东地缘政治中阿拉伯的意义),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8, 1, 3-24.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的各期月刊。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负责。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Robert Kappel；杂志系列总负责：André Bank、Hanspeter Mattes

翻译：曹娟 (Cao Juan)；审校及排版：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giga-focus@giga-hamburg.de>；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出版说明